

浙江省数字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研究

——基于产业升级视角

胡丽娟¹, 胡海雁²

1.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投资保险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2. 宁波银行, 浙江 金华 321000

DOI:10.61369/SE.2025110026

摘要：本章主要对共同富裕指数进行了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同时分析了浙江省共同富裕指数的现状。首先，构建了一个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并用熵值法对指标进行赋权，最终用2011年到2022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对浙江省共同富裕指数进行测度分析，得到共同富裕综合指数。通过运用Stata17统计软件，以共同富裕指数为因变量，以数字普惠金融为主要自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作为中介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为控制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回归。结论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浙江省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为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共同富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进一步开展中介效应分析，结论显示显著。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共同富裕；产业升级

Research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Effect of Digital Finance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Hu Lijuan¹, Hu Haiyan²

1.School of Investment and Insurance,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2.Ningbo Bank, Jinhua, Zhejiang 321000

Abstract : This chapter mainly constructs and measures the index system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and at the same tim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in Zhejiang Province. Firstly, a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system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entropy method was used to weight the indicators. Finally, the 1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2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o measure and analyze the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common prosperity was obtained. By using Stata17 statistical software, with the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s the main independent variable,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human capital level, degre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degree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s the control variables, multicollinearity regression was conducted.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positive promoting effect on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empowering common prosperity, a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conducted, and the conclusion was significant.

Keywords :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ommon prosperity; industrial upgrading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理

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效率得以提升，为产业发展和升级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接着，缓解融资约束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步骤。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降低融资门槛，使得更多企业能够获取到发展所需的资金，从而加速了产业升级的进程。在此过程中，金融供给端与产业需求端的

紧密对接显得尤为重要。金融供给端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产业需求端多样化的融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的升级和发展。数字金融作为本机理图的核心环节，通过引入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使得金融服务更加便捷、高效。数字金融的发展不仅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还推动了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数字科技在推动产业升级和提高创新活力方面发挥了

基金项目：浙江省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浙江省数字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研究——基于产业升级视角的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24ZD09）；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财富管理数字化背景下金融科技创新人才定向培养项目（项目编号：2023122171695）

重要作用。通过应用先进的数字技术，企业能够优化生产流程、提高产品质量，进而提升市场竞争力。数字科技的普及和应用还激发了创新创业的热情，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最终，这些环节共同作用，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进而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通过优化金融服务、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我们共同为构建富裕、和谐的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浙江省共同富裕指数测算及分析

本文选取2011年至2022年浙江省的1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值法进行共同富裕指数测度分析。在此基础上借助几何平均数模型构建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模型。数据来源于各市统计年鉴、EPS数据库中的浙江省统计数据等。为规避异方差影响，将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针对个别缺失数据，使用趋势外延法进行填补。

浙江省2011年至2022年11个市的共同富裕综合指数。可以看出，共同富裕指数最高的三个地区是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其平均富裕指数达到了0.64、0.5、0.38。

年均增长率最快的地区分别是丽水市和衢州市，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3.26%和23.03%。排名居于第二梯度的有金华市14.98%、湖州市14.84%、舟山市14.71%、温州市14.43%、台州市14.38%、绍兴市13.83%、嘉兴市13.67%。在2021年开始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衢州同比增长22%，丽水市和湖州市同比增长了18%；2022年，金华市的同比增长率最高为15%，衢州市同比增长了11个百分点。特别是在2021年以来增长率相对2020年均大幅度增长：衢州市、台州市、湖州市、丽水市、宁波市、杭州市均比上一年的同比增长率增加超过10个百分点，嘉兴市、温州市、舟山市均增加了9个百分点。

其中属于第一梯队的是杭州市和宁波市2012之前之前差距较小，2012年之后差距逐渐拉开。大部分地区都属于第二梯队，其中温州发展较快，居于第二梯队的首位，且与其他地区拉开了一些差距，而之前排名末尾的湖州开始赶超舟山。衢州和丽水属于第三梯队。

2022年，从共同富裕指数中杭州市和宁波排名靠前分别是0.99、0.79，衢州市和丽水书排名较为靠后，分别是0.29和0.28，温州市为0.61、嘉兴市为0.57、绍兴市为0.54、台州市为0.49、金华市为0.48、湖州市为0.44、舟山市为0.41。

三、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证研究

使用 STATA 软件导入相关数据，通过相关代码，得到了相关的描述性和相关性统计的结果。分别输入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指数 (CP)，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ISU)，数字普惠金融 (DF)，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GDP)、人力资本水平 (HUM)、政府干预程度 (GOV)、对外开放程度 (FDI)。采用了2011年至2022年浙江省11个市的共计924个面板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显示，所有的变量都在0.05水平上显著。

由于各种研究变量之间的影响比较复杂，本文以共同富裕指数为因变量，以数字普惠金融为主要自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作为中介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为控制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回归。回归分析的结果

运用方差膨胀因子 VIF 对各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因子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中最大的 VIF 值为 6.91，平均值 3.36，均小于 10。F(10,116) 的结果为 18.96，P 值 (Prob>F) 为 0.0000 检验的显著性小于 0.05 通过检验，Hausman 检验中，小于 0.005 显著性检验通过。

因此，可以判断本文所选取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同时，根据 F 检验、Hausman 检验的结果，本文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表回归表格 1

	模型 1	模型 2
	cp	cp
gdp	0.000*** (14.755)	0.000*** (2.973)
hum	0.000*** (4.086)	0.000*** (4.193)
gov	0.027 (0.012)	-3.458** (-2.392)
fdi	-0.003*** (-4.824)	-0.002*** (-5.210)
df		0.001*** (12.950)
_cons	-0.229*** (-4.804)	-0.019 (-0.541)
N	132	132
R ²	0.846	0.937
F	161.254	346.343

***p<0.01", **p<0.05", *p<0.10

运用 Stata17 分别对两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1 针对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GDP)、人力资本水平 (HUM)、政府干预程度 (GOV)、对外开放程度 (FDI) 对因变量进行回归；模型 2 加入关键自变量数字普惠金融 DF_{it} ，做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分析。其中 *、**、*** 分别表示在 10%、5%、1% 下的显著性水平。

从模型 1 可以看出，在控制变量方面，初步观察发现，对外开放程度 (FDI) 的系数或不显著，或显著为负。本文认为，剖析其因，外资进入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其主动机仍是获利。值得注意的是，外资涉及、公共给产品供给、民生相关领域较少，主要涉足的有传统制造业及资本市场。因此，在外资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其积极作用得以弱化。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对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和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这意味着国家有更多的财力来投入到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领域，从而为全体人民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条件。这些福利的提高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人力资本对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关键作用。人力资本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教育水平、技能水平和健康状

况等。较高的人力资本意味着更高素质的劳动力，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高素质的劳动力还能够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从模型2中可以看出，在1%的水平下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浙江省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中介效应模型1	中介效应模型2
	isu	cp
df	7.257*** (4.977)	0.001*** (12.225)
gdp	-0.002 (-0.271)	0.000*** (4.560)
hum	0.003 (0.929)	0.000*** (5.051)
gov	-6.66e+04*** (-2.846)	-0.487 (-0.469)
fdi	-44.490*** (-6.841)	-0.000 (-0.328)
isu		0.000*** (11.195)
_cons	2752.172*** (4.914)	-0.141*** (-5.355)
N	132	132
R ²	0.694	0.970
F	52.582	618.851

***p<0.01", **p<0.05", *p<0.10

为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共同富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进一步开展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模型1中，针对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GDP*)、人力资本水平 (*HUM*)、政府干预程度 (*GOV*)、对外开放程度 (*FDI*) 以及因变量自变量数字普惠金融 (*DF*) 对产业结构升级 (*ISU*) 做回归分析，结论显示显著；^[1-3]

中介模型2中，针对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 (*CP*)，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 (*ISU*)，自变量数字普惠金融 (*DF*) 以及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GDP*)、人力资本水平 (*HUM*)、政府干预程度 (*GOV*)、对外开放程度 (*FDI*) 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 (*DF*) 在1%的水平上显著，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 (*ISU*) 在1%的水平也显示显著。结合前面的回归模型系数，从而得出，中介变量为部分中介。

	(1)	(2)	(3)
	df	cp	cp
ldf	0.879*** (76.445)	0.001*** (14.225)	0.001*** (13.805)
gdp		0.000*** (2.867)	0.000*** (4.743)
hum		0.000*** (4.286)	0.000*** (5.345)

参考文献

[1] 邵平. 产业金融数字化的新机遇 [J]. 中国金融, 2020(8): 58-59.
 [2] 张芳, 蔡甜甜.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4, (01): 109-114.
 [3] 谭燕芝, 施伟琦.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J]. 经济经纬, 2023, 40(02): 55-65.

gov	-3.879*** (-2.773)	-1.361 (-1.371)	
fdi	-0.002*** (-4.953)	-0.000 (-0.451)	
isu		0.000*** (10.796)	
_cons	49.467*** (18.598)	0.022 (0.646)	-0.101*** (-3.908)
N	121	121	121
R ²	0.982	0.942	0.973
F	5843.871	340.937	616.197

***p<0.01", **p<0.05", *p<0.10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采用须滞后一期的数字普惠金融要素，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由此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度较好，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相关，在1%的显著性下显著，核心解释变量、中介变量、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与回归结果检验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且通过显著性检，说明回归结果的稳健，文章研究结论可靠。

四、结论与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三大核心途径：融资约束缓解、创业活力提升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对实现共同富裕产生了深刻且多维的影响。

首先，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关键路径，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中介传导作用。它有效降低了金融服务门槛，为经济活动注入活力，显著推动了共同富裕进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效应在传统金融体系本就较为发达的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有效缓解融资约束，数字普惠金融切实促进了地区富裕程度、共同富裕水平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充分证明了该路径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

其次，提升创业活力是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另一重要支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供便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有效激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创业热情和活力。这种活力的释放，通过部分中介效应，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持续的动力来源。

最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构成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同样展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它通过引导资金流向更高效、更创新的产业领域，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一效应在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较高的地区作用更为显著。通过驱动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同样有力地提升了地区的富裕程度、共同富裕程度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性，有力印证了该路径的有效性。